

话语的概念内涵与话语分析的理论系谱



罗桂花*, 刘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 话语分析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途径, 所涉及的学科、学派与理论广泛。相关研究文献同以“话语”或者“话语分析”命名, 但其中“话语”的概念内涵与分析模式差异显著, 背后实则是理论源流与理论系谱的不同。早期话语分析关注语言结构, “话语”被定义为超出单句长度的语段, 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功能视角的话语分析强调语言的应用, 突出语言使用者、语言使用者目的和意图, 或者是情景语境, 包括形式/功能分析和语境分析两种路径。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分析, 致力于揭示话语中的社会矛盾、冲突与公平问题, 以及在宏观社会文化历史进程中话语的建构作用, 话语是语言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社会实践形式, 属于后结构主义范式。功能视角与后结构主义范式话语分析相融合后产生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跨学科领域, 秉承后结构主义语言观, 关怀社会实践层面, 同时重视语言文本。Van Dijk 的“话语-认知-社会”分析模型、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模式, 以及 Fairclough 的“社会事件-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 话语; 概念内涵; 话语分析; 理论系谱

DOI: [10.57237/j.ssr.2023.02.003](https://doi.org/10.57237/j.ssr.2023.02.003)

The Concepts of Discourse and the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Discourse Analysis

Luo Guihua*, Liu M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approa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schools and theories. Amo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which are named “discourse” or “discourse analysi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analysis frameworks, which are actually differ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genealogy. In early studies, in view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discourse is defined as “language above the sentence”,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s focused on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The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emphasizes the use of language, highlighting the language users, the purpose and intention of the language users, or the situational context, including form/function analysis and context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 in approach of post-structuralism, discourse is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in which language plays a central role”,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s dedicated to revealing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conflicts and fairnes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discourse in the macro-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The convergence of functional perspective and post-structuralist paradigm of discourse analysis has led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hich inherits the post-structuralist view of language, cares about social pract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linguistic texts. van Dijk's “Discourse-Cognitive-Social” analysis model, Wodak's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刑事诉讼话语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20A528).

*通信作者: 罗桂花, Luowenting8552@126.com

收稿日期: 2023-02-23; 接受日期: 2023-04-10;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4-25

<http://www.socscires.com>

“Discourse/Histor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odel, and Fairclough's “Social event, So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structure” analytical framework a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words: Discours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etical Pedigree

1 引言

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在二十世纪末迅速崛起, 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活跃的理论之一[1]。话语分析不仅涉及语言学, 还介入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教育学和哲学等。国内多篇论文对话语分析二十年[2]、五十年[3]的发展进行了大跨度综述, 也有不少学者梳理了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4], 对话语分析研究者了解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系谱颇有助益。但是, 鲜见对“话语”概念展开专门讨论, 仅田海龙、程玲玲撰文讨论了“discourse”一词的不同含义及其汉译[5]。实际上, 以“话语”或“话语分析”冠名的文献所指的“话语”概念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6],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基于不同哲学立场, 结合不同学科理论, 发展出不同的话语分析理论, 构建了多样的分析模式, 给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造成了一定困惑。因此, 本文结合不同理论源流梳理话语概念内涵的发展与差异, 介绍不同概念内涵与理论源流之下典型的话语分析理论学派与分析模式, 有利于界定话语的基本概念、了解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揭示不同理论学派本质特征。

2 结构主义范式的话语概念与研究模式

最早提出“话语分析”概念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Harris, 他于 1952 年在《语言》(Language) 杂志上发表论文“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开端。Harris 将形式描写的方法扩展到对“连续的言语 (或) 文字的分析”, 运用替换和分布的方法分析一组句子之间的关系与结构, 讨论“如何分辨一组语句是相互衔接组成有机的整体, 即文本, 还是一组无关语句的随机组合”[7], 属于典型的结构主义意义话语概念和分析方法。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 语言被视为一个“系统”, 其主要任务是描述与解释语言作为系统的运作方式, 语

言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语言基本单位组合的规则是什么。也就是说, 语言具有不同层次的结构, 较小单位的语言结构相互连接组成较大单位的语言结构, 不同层次的语言结构依照一定规则逐层递增,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8]。将“话语”定义为“超出单句长度的语段”, 认为话语分析是“超越单句的语言分析”, 处理超句 (supra-sentential) 现象[2]体现的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这一传统强调结构, 话语分析的核心任务是分析句子如何组合成更大的语言结构从而形成连贯的文本。早期的话语分析基本属于这一传统, 比如 van Dijk 早期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 以转换生成句法为蓝图, 提出“宏观结构 (macrostructures)”的概念以研究文本语法 (text grammar) [9]。早期话语分析包括衔接与连贯、指示、信息结构、语篇/话语类型等研究, 常被称为“篇章语言学”或“篇章语法”, 研究对象多为书面语篇, 基本不考虑语境和使用等因素。

这一传统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之一的是伯明翰话语分析学派。他们以课堂互动话语为语料, 以超句为单元, 根据结构语言学的准则, 特别是语言系统的阶层 (rank scale) 观, 采用传统语法分析和结构语言学用于分析孤立句子的等级结构描写方法, 研究课堂互动话语的宏观结构模式和框架, 对会话结构和语篇连贯研究做出了贡献[10]。他们针对课堂互动话语设计了包括“授课 (lesson)、交往 (transaction)、对应 (exchange)、行动 (move) 和行为 (act)”的话语描述模式[11], 后又改进为“交往 (transaction)、序列 (sequence)、对应 (exchange)、行动 (move) 和行为 (act)”[12]。“交往”是最大的分析单位, “序列”构成“交往”, “对应”构成“序列”, “行动”是“对应”的构成单位, “行为”则是“行动”的基本单位。伯明翰话语分析运用等级结构模式以编码的方式对话语的结构进行层次描写, 忽视了话语的内容, 脱离了话语的语境因素, 难以确定某一话语的功能, 也难以精确地描述话语的结构特征。

就如句法研究一样, 结构主义范式话语分析仅关注语言本身的形式结构, 遭到了不少语言学者的批评。

其中一个质疑为是否可以仅依据形式/结构标准来区分一组语句是文本还是一组随机组合的句子[13]。在语音学和句法学中,仅凭借对语言结构的掌握,而不需要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就可判断/krin/是英语中的一个单词,而/rkin/不是,以及某一句子是不是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但是,我们不能只根据语法规则和超句的语言结构特征来判断它是否是连贯的文本,还应该纳入读者的背景知识和作者的可能意图,而这就不是“超越句子之上的语言单位”的定义所能概括的了。另一种异议认为“话语不必大于一个句子”[14]。的确,话语可以小于单句,可以是一个单词,甚至一个字母。例如公共厕所门上的单词“Ladies”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话语,又比如表示停车位的字母P,均表达独立的意义,都是小于句子的语言单位,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本,一个话语。当然,对“Ladies”之类作为话语及其含义的理解依赖于未包含在文字本身中的真实世界知识,这再一次证明对于任何文本的理解都有赖常识和语境信息。

3 功能视角的话语概念与研究模式

之后,话语分析的讨论从“结构”转向了“功能”与“语境”,跳出了纯粹语法结构的层次,转向日常使用的口语与书面文本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或其所实施的特定社会功能。比如,Brown和Yule就提出“话语分析致力于考察语言用来干什么”[15]。Taylor则强调“话语分析是对使用中的语言的全面细致分析”[16]。这一视角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根据主要是广义的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6]。功能语言学中,意义不再是话语或者文本的内在特性,而来自于语境中语言的使用。在实际生活中,语言可以传达信息,可以显示语言使用者的意图,表达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也可以完成具有社会意义的不同活动,而话语分析就是尝试从语言中将功能或意义还原[17]。功能视角话语分析将话语定义为“语言的应用”或者“使用中的语言”,相较于结构主义立场的“超出单句长度的语段”之定义,不再纯粹关注语言的形式与结构,而是将重点置于语言使用者,语言使用者的目的和意图,或者是情景语境,更注重语言的功能,更贴近社会层面。

功能视角的话语分析又可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形式/功能分析(form-function analysis),分析语言的话语类型意义(utterance-types meaning),即根据语言使用的常规期待所产生的意义解读,而没有根据特定语

境去推导说话人意图;另一种是语境分析(context analysis),分析语言的话语例型意义(utterance-token meaning),即根据特定语境推导所得的特殊会话含义[18]。形式/功能分析,主要基于系统功能语法,话语中不同语言资源的选择是为了实现社会交际的某种功能,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分别与语法层次的各个系统联系,意义从而得以实现。功能是基础,语言系统是实现功能的形式,语言与社会通过“功能”建立有机的联系。而话语分析则将融为一体的功能与语言系统一一还原。从功能出发分析语言的使用就是还原文本中语法结构所实现的交际目的,分析交际过程中语言结构的选择在特定社会交际语境中所实施的特定社会功能。Brown和Yule的专著《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就是形式/功能路径的代表作,注重语言在使用中的交际功能,并提出语言主要实施两种功能:事务性功能和互动性功能,前者是对内容的表述功能和信息的传播功能,后者是表达个人态度立场,建立或维护社会关系的功能[15]。

从语境出发讨论话语则侧重特定的语言结构在特定交际语境中的情境意义,主要是分析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所产生的对社会生活的不同理解,研究对象更加突出真实语境中使用的语言。这其中涉及多个学派提出的分析模式。最直接处理语言与社会语境关系的是语用学,语用学对一组语言结构的考察并不着眼于其字面上的意义,而是关注特定情景中的意义,特别是不同的语言交际情景下,如何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注重人们通过语句所要表达的沟通意图[18]。除此之外,会话分析的语境分析主要是考察在交互式会话环境中、自然发生的会话中的会话结构,特别是在交际互动的情境中出现的规律的、重复的模式,疏离宏观社会语境[4]。另外,交谈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of speaking)在更大范围进行语境分析,主张话语分析必须把整个社群纳入语境,考察特定文化情境中的言语事件及其语境图式,强调说话者的交际能力,即说出的话适合语境。体裁分析注重专业语境,关注学科、专业或机构实践中的话语行为,通过体裁这样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来解释专业实践,分析实践中体裁运用的显性和隐性含义,以理解、阐释专业人士是如何运用话语资源来实现其专业目的[19]。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语境出发的话语分析的研究重点从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中的语言结构分析,逐渐转向文化语境中图式、体裁等的考察。

4 后结构主义途径的话语概念与研究模式

话语,无论是被界定为“超出单句长度的语段”还是“使用中的语言”,都由语言学者从语言学出发展开分析,都是将话语视为一个复杂客体,前者从语法结构这一分析单位入手,重点处理句子与句子之间衔接与连贯的关系;后者则从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入手,分析交际功能或者语境意义。19世纪70年代后,“话语”概念频繁出现在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和文化分析等研究中。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语言本身不是话语分析的落脚点,而只是透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途径。话语是“语言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社会实践形式”[17]。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话语分析,不再聚焦语言学分析,不关注文本的语法形式结构,也不重视语法结构可以在社会交际中实现何种功能,而是关心话语所折射出的社会实践、社会事实及其相关问题,致力于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制度、权力关系等,以及话语在宏观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建构社会、调节并控制知识、社会关系和机构的作用。

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话语分析就进入了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功能视角的话语分析也涉及社会因素的讨论,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意义关系是稳定的、约定俗成的,所以,话语分析的任务是还原语句所实施的交际功能或者其在特定情境中的意义。而当话语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则世界并不先于、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而是通过语言的描述与记录得以建构,世界是语言建构的产物,而这些描述与记录本身也是被建构的,所以,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稳定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论立场被称为后结构主义[20]。后结构主义并不否认语言之外有一个真实世界,而是强调有关这个真实世界的感知与记录都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浮动的,意义的产生可跳脱语言结构本身,而嵌入特定历史与政治关系的可能性条件中[21]。这个条件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意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关系决定的,权力关系可以使语句成为具有制约功能的话语,而这个借由权力关系所建构的话语,同时可以介入权力关系中成为行动主体,并在权力关系中发挥控制的作用。因此,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关心的是话语和话语中的语言选择如何塑造、建构互动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

和文化语境中产生、再现、塑造权力;如何通过语言操纵社会活动,创造、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结构;以及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结构如何被合法化和合理化。

在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中,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Foucault 的思想影响最大,奠定了这一范式话语分析的基础。Foucault 认为,话语不是一组携带意义系统的符号组合,而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谈论某一特定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者表示方式[22]。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是一种社会实践。话语建构主题,界定并生产知识对象,规定谈论特定话题的方式,界定说话、写作或者个人行为的方式。Foucault 特别重视权力在话语建构中的作用,意义再现是有条件的、由各种权力关系竞争之后所形成的话语,是各种权力交锋竞争之后的一种体现;再现不仅仅是意义的探索与诠释,而且还是通过话语所进行的一种知识生产,也就是,话语形成我们认为符合某种真实的知识,知识是由话语实践建构的[23],反过来,任何真实的再现,实质上是各种权力较量后的话语。话语实践说明权力与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谁有权说什么、从什么立场、产生什么影响都是经由话语调节,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以可见、独立的主体,在他人交流中、在社群中,塑造什么是现实。所以,对于 Foucault 流派的政府治理研究、霸权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话语理论研究来说,社会关系塑造话语实践并同时被话语实践塑造,体现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在这一视角下,社会和社会成员、社会不平等性、社会和文化秩序以及他们的主体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在话语实践中产生或消失。话语不仅仅表征了社会中人们的所思、所为和所是,表征世界的同时还建构世界。

5 研究范式的融合与发展: 批评话语分析

语言学领域与社会学领域的话语分析在很长一段时间循着各自的路径发展,很少对话,学派之间甚至对彼此的研究成果与观点视而不见。所以,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因其应用性与微观性,被称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相关研究,具有理论性与宏观性,而被称为“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24]。而且,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的

概念被提出来以倡导二者合流。这种合流发生于英美语言学界中部分从事话语分析的语言学者吸纳包括 Foucault 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当话语侧重语言的应用与功能,同时又注重对社会现象的批判,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与社会批判就开始融合并发展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 Fowler 为代表的语言学者提出语言使用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的反映,它构成社会意义和社会实践,并通过对媒体话语的分析来讨论语言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概念[25]。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更多的语言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从语言学分析跨向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让功能视角和后结构主义途径这两种取向的话语分析进行对话,还尝试融合两种取向,从而形成了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学派。批评话语分析秉承后结构主义语言建构论,关注语言文本,同时从语言层面出发关怀社会实践层面,特别关注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对权力和公平的话语维度,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特别感兴趣,通过揭露并试图抵制现实社会中权力的不平衡、不平等、不合理的、不公平社会行为和现象,从而达到质疑、改变语言使用现状,进而改变社会活动、消除不公平的最终目的[6]。

批判话语分析流派中贡献多、影响大的首推荷兰学者 van Dijk。他特别关注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题,深受后结构主义关于知识、权力和话语的观点的影响,同时也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各领域研究成果,形成了“话语-认知-社会”分析模型,致力于从语言文本中挖掘或提炼出隐藏在政治话语或媒体话语字里行间、人们往往习而不察的各种带有种族偏见或敌意的意识形态[26]。在“话语-认知-社会”三角互动中,“认知”被认为扮演着最关键的中介作用,连接“话语”与“社会”。“认知”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内在机制,既包括特定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社会信仰,如社会规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还包括促使这些社会信仰得以有效运转的认知策略,如诠释、引申、比较与评估等。其中,“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认知,也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再现,由社会实践,特别是“话语”产生。“话语”不仅是言语活动的产品,更是一种社会沟通传播实践,不仅包括可观察到的书面语和口头言语活动,还包括了在理解与生产这个话语时所介入的认知再现策略。所以,分析“话语”,就是分析“话语”的社会认知过程,也就是在某一特定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过程中“社会认知”的塑造与再塑造。van Dijk 认为语言使用者会从语言的

不同层次同步操作,并利用从文本和语境中所获得的知识来解读或理解话语,这个心理过程被称为话语心理过程。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需要预先的关于社会的知识,经由介于文本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社会认知,通过语境化的过程来产生和理解话语。因此,研究者要对话语进行解释,不能仅局限在语言的内在结构与认知操作,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话语,必须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过程中来解释[27]。

奥地利学者 Ruth Wodak,与 van Dijk 一样在批判话语分析学派中具有重要影响,所提出的“话语/历史”批判话语分析模式在国内学者中影响广泛。该分析模式中,“话语”被定义为“特定社会行动场域中、依赖语境的符号实践”,不同的行动场域由不同的话语实践功能所定义,话语被社会建构同时建构社会,通常与宏观主题相关,并以真实有效的论证的形式介入社会行动中。Wodak 常运用“论证理论(argumentation theory)”来处理文本,最常使用的分析策略包括指谓/命名策略、谓语修饰策略、论证策略、观点与框架或话语再现策略、强化或淡化策略等,这也是最常被说话者用来合理化其结论的五项策略。“历史”主要指历史语境的重建,任何特定话题,都应通过检视各种类型的历史资料来重建该研究话题的相关的语境。Wodak 提出了“三角校正途径(triangulatory approach)”来实现跨领域、跨学科、跨理论的交叉验证以实现语境化与再语境化。语境是话语/历史分析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语境的还原与重建是该分析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则,Wodak 特别重视语境的还原与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强调话语仅在特殊语境下才可以描述、理解与诠释,并将再语境化分为四个层次:(1)上下文或文本内含的语言,(2)文本、文类与话语之间的互文性与话语间性,(3)语言之外的相关社会变化与制度程序;(4)与话语实践相关的更宏观的社会制度与历史情境。四个层次由里而外,从微观到宏观,从文本到社会宏观结构,将文本背后的“历史”还原,甚至是重建出来[28]。

另一位重要代表 Fairclough,与 van Dijk 和 Wodak 一样都是批判话语分析学派领导人物。van Dijk 和 Wodak 比较关注种族认同与种族歧视文本,而 Fairclough 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关注在特定社会或政治变迁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如何通过话语策略将个人或者群体的理念打造成官方/公共话语,甚至将之塑造成政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选择、排列、重组、强化、弱化等话语策略操纵文本而建构成官方/公共话语,之后官方/公共话语又如何推动

社会变迁,进一步驱动下一波话语的解构、重构与再建构。Fairclough 所提出的批判话语分析框架有意识地整合活跃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多位重要欧陆思想大师的理论精髓,这一点引起了学界的不少争议,也使得他本人一再修订自己的分析框架。Fairclough 首先提出的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三向度分析框架,包括“文本(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29]。“文本”向度的分析主要是对文本中的语言结构进行功能分析,“话语实践”向度是文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主要处理文本如何被生产、配置、接受与理解的过程,也就是话语之间彼此支配、竞逐、重组、吸纳与再配置的过程,主要通过互文分析来实现。“社会实践”主要是处理社会宏观层面的阶级、集团、社群与团体等权力关系的建立、维持、变迁与话语实践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后来, Fairclough 将三向度修改为“风格(style)”、“话语”和“体裁(genre)”的三面向分析[30],后又将分析框架修订成“社会事件(social events)”、“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从具体到抽象的三个层次[31]。“社会事件”指的是社会正在发生或过去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例。“社会实践”则是社会事件背后的习俗、习惯以及制度化模式,与特定的制度与组织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结构指的是普遍且持续的社会特征,是一种可能。这三个层次均有其“符号化时刻(semiotic moments)”,并各自建构其话语层面(discursive aspect)。其中,“文本”,由不同权力与资源在话语秩序之间交互角逐与竞争的结果,建构了社会事件的符号化时刻,具有行动、再现(representation)和认同(identification)三种意义。社会实践的符号化时刻是话语秩序(discourse orders),是由不同话语、不同风格与不同体裁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聚合物(configuration)。“文本-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三向度分析框架主要以单一文本为中心而展开,“社会事件-社会实践-社会结构”三层次分析模型更合适通过多个文本范例来讨论一个宏观的议题或者总体社会政治的变迁。

批评话语分析学派不同学者的理论中,话语的概念内涵还是有所不同的。van Dijk 的理论中“话语”是“沟通事件”,包括会话互动、书面文本、印刷品以及其它的符号化形式,是一个偏向语言学的概念,“文本”则是包含在话语中的语言学客体之一, van Dijk 的批评话语分析针对沟通事件的认知进行研究,也就是针对特定话语的生产与理解过程进行分析,通过认知层面的探讨,将文本背后的语境,即不同社会团体的知识、理念与信仰等重构出来。而 Fairclough 的理论是要呈现文

本背后不同话语之间如何进行竞逐与交锋的过程,“文本”指“任何语言运用的实例”,是不同话语竞逐交锋的结果,话语的概念则更偏向社会学,是“建构世界不同层面的符号化方式”。van Dijk 的“话语”概念,某种程度上接近 Fairclough 的“文本”概念。Wodak 的话语概念,“特定社会行动场域中、依赖语境的符号实践”,更接近 Fairclough,同时吸纳了 Fairclough 与 van Dijk 两人对“话语”的见解。相同的是,他们都注重话语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建构作用,关注话语如何再现和重塑社会实践、社会事实、社会关系及社会身份;同时注重文本的语言学分析,通过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揭示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变迁等。总的来说,批评话语分析,本质上秉承建构论立场,具有后结构主义话语概念内涵,关注社会问题,从语言学向度切入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语言分析是出发点,采用了许多语言学架构内话语分析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最终关怀则是社会实践,在研究语言本体属性的基础上以语言为工具对世界进行批判和改造[32],深入探索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形成跨学科的融合。

6 结论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话语是超出单句长度的语段”,到功能视角的“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到后结构主义途径的“话语是社会实践”,再到功能视角与后结构主义范式话语分析相互交融、形成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经过不断发展与迭代,话语分析无疑已是质性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之一。任何人想要了解话语分析这一领域都必须了解话语的概念内涵,因为被冠上话语的研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模式,这是话语分析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同学科或理论传统的人以不相同的方式定义它,不同的话语概念内涵背后是理论源流和理论系谱的不同,并由此形成多样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模式。如果对话语概念内涵理解不充分,可能会引起混乱,因此,对话语概念的理解与理论流派溯源是开展话语分析研究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施旭. 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 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 [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1): 131-140.

- [2] 徐赓赓. 话语分析二十年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1): 14-20.
- [3] 朱永生. 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3 (3): 43-50.
- [4] 杜金榜. 试论语篇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J]. 外语学刊, 2008 (1): 92-98.
- [5] 田海龙、程玲玲. “Discourse”的含义及其汉译 [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 68-72.
- [6] 黄国文、徐珏. 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10): 1-6.
- [7] Harris Z. Discourse Analysis: A Sample Text [J]. *Language*, 1952 (4): 474-494.
- [8] Coulthard M. Discourse Analysis in English: A Shor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Language Teaching*, 1975 (2): 73-89.
- [9] Van Dijk T. A. *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s: A Study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M]. De Gruyter Mouton, 1972.
- [10] 辛斌, 苗兴伟. 话语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略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8 (4): 67-71.
- [11] Sinclair, J. M. & Coulthard, M.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The English Used by Teachers and Pupil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2] Stenstrom, A. B.,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M].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13] Angermuller, J., Maingueneau, D., & Wodak, R. The Discourse Studie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A]. In J. Angermuller, D. Maingueneau, & R. Wodak (eds.), *The Discourse Studies Reader: Main Currents in Theory and Analysis* [C].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14] Widdowson. H. G.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J]. *Language & Literature*, 1995 (3): 157-172.
- [15]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Taylor, S. Locating and Conducting Discourse Analytic Research [A]. In Wetherell, M., S. Taylor & S. Yates (ed.),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 [C].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17] Cameron, D., & Panovic, I. *Working with Written Discourse* [M]. Sage Publications, 2014.
- [18] Gee, J. P.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M] Routledge, 1999.
- [19] 韩晓玲, 陈忠华: Dell Hymes 及其“交谈民族志”理论 [J].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115-122.
- [20] 杨大春. 文本的世界: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1] Chouliaraki, 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F. Bennet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ultural Analysis* [C]. Sage Publications, 2008.
- [22]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Pantheon Books, 1972.
- [23] 宁倩, 付建舟. 话语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演进——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本”为例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82-89.
- [24] Wang J & Jin 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a: Histor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M. Aronoff (ed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 [25] Fowler, R., Hodge, G. K., & Kress, G. T. Trew. *Language and Control*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26] Van Dijk, T. A. Socio-cognitive Discourse studies [A]. In J. Flowerdew & J. Richardso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Routledge, 2017.
- [27]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8] Reisigl, M. & R. Wodak.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Sage Publications, 2009.
- [29]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Polity Press, 1992.
- [30] Fairclough, N.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M]. Routledge, 2002.
- [31] Fairclough, N.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Change* [M]. Routledge, 2003.
- [32] 陈平, 话语的结构与意义及话语分析的应用 [J] 当代修辞学, 2017 (2): 1-11.